

前 言

这本小书能按期完成，我真是感到如释重负。从酝酿到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就对综合英语教材研究萌生了兴趣，只是苦于水平有限，一直不敢动笔。直到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邹为诚教授的鼓励^{*}，才斗胆把它写了出来，目的是为了提升自己对教材的认识、了解与鉴赏力。当然，我也愿意将它奉献出来，希望得到专家、同行们的批评指正。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许多的支持与帮助。刘青老师在认知心理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弥补了本人在该领域的研究缺憾。绪论部分的图表设计得力于肖水来老师的帮助，李晚景女士帮助校对了对部分文字，唐进老师等在数据分析上给予了大力帮助，黎娜老师的真知灼见常常让陷入写作困境中的我思路豁然开朗。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另外，王森林老师等同事在工作上的支持使我得以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进行写作，对此，我也深表感谢。还有，如果不是我最好的朋友 Roger Boston 教授的不断鼓励，如果没有我的儿子的理解与支持，本书也难以完成。最后，要特别感谢的是本书的责任编辑郑京华女士，是她的鼓励与帮助让我坚持到了最后。

^{*} 据2005年06月22日，邹为诚教授给笔者的电子邮件。

本书尽管属于学术研究范畴，但因为与学习者的关系甚为密切，所以读者对象范围较广，包括英语教学研究者和作为教材使用者的英语专业的教师和学生。

尽管本书写作的时间很长，但我还是感到时间紧迫，对其中的很多问题未能仔细探究，加上水平仍然有限，错误与不足之处一定在所难免。而且，虽然本书算是完成了，但是我对教材的研究尚未结束，但愿将来能做得更好一些。

刘晓华

于咸宁学院外国语学院

2006年6月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二章	认知与综合英语教材设计	/ 28
第三章	需求分析与综合英语教材设计	/ 84
第四章	文化需求与综合英语教材设计	/ 151
附录一	需求分析调查问卷	/ 215
附录二	文化调查问卷	/ 221

绪 论

首先, 我们有必要对本书所涉及的重要概念作一些说明。

1. 基本概念

1.1 培养目标

关于高等院校英语专业的培养目标, 我们理所当然地采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于 2000 年 3 月修订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 中的有关规定。《大纲》明确指出:

21 世纪是一个国际化的知识经济时代,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决定了 21 世纪我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和规格: 这些人才应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素质。也就是要在打好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和牢固掌握英语专业知识的前提下, 拓宽人文学科知识和科技知识, 掌握与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有关的专业基础知识, 注重培养获取知识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创新的能力, 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

1.2 课程内容与教材内容

根据俞红珍(2005)的描述,课程内容是指特定形态课程中学生需要学习的事实、概念、原理、技能、策略、方法、态度及价值观等。课程内容的选择有三种基本趋向:学科知识、当代社会生活经验和学习者的经验。对于教师而言,它回答的是“教什么”的问题;对于学生,它规定了“学习什么”。而“用什么教”就是教材所关心的问题,“它包括一切有效地传递、体现课程内容和承载课程价值的文字与非文字材料”。教材内容是课程内容的物化,即教材化,教材内容受制于课程内容,必须反映课程内容,但课程内容仅仅教材化是不够的,还应该教学化。所谓教学化就是指教材内容的编写必须顺应学生学习活动的心理过程,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

1.3 综合英语/基础英语/精读

综合英语、基础英语与精读这三个概念有时候会互换着使用,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采用“综合英语”这一名称。

1.4 学生/学习者/被试

学生与学习者也是互换着使用。被试指的是本书中的研究对象,但有时候也会用学习者或学生来代替。

1.5 参考文献

本书中的参考文献主要来自于中国期刊网,当然也有从图书馆里找到的资料。有时候当我们说“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关于什么什么的最早的文献”时,我们指的是基于我们的条件我们所能找到的,并不一定是已有文献中最早的。

2. 综合英语课程

本书所研究的英语专业综合英语课程，又称英语精读（如杨立民，2003），还被称做基础英语（如《大纲》，2000），是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在一、二年级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主干课。本书把它称作“综合英语”是因为越来越多的高等学校在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中使用了这一名称，而且越来越多的英语教材研究也使用了这一名称。那么综合英语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课程呢？它在整个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它本身具有什么样的性质？这些都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问题。

2.1 定义

我们认为，《大纲》对综合英语（基础英语）课程的定义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本书除了采纳《大纲》对该课程的基本定义之外，还作了一些补充。因为作为一门在低年级开设、周课时在6~8节的专业主干课程，综合英语课不仅在语言技能和语言知识方面承担着挑大梁的重任，在学生的价值观与文化观的培养、思辨能力的培养、学习能力的培养、自信心的培养等方面也是责无旁贷。《大纲》将综合英语（基础英语）定义为：“一门综合英语技能课，其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运用英语的能力。”该课程“主要通过语言基础训练与篇章讲解分析，使学生逐步提高语篇阅读理解能力，了解英语各种文体的表达方式和特点，扩大词汇量、熟悉英语常用句型，具备基本的口头与笔头表达能力。教师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的各种语言交际活动以获得基本的交际技能，并达到新《大纲》所规定的听、说、读、写、译等技能的要求”。《大纲》对该课程的定义主要涉及的是学科知识，而俞红珍（2005）认为，一门课程的内容取向应该是学科知识、当代社会经验、个人经验三方面的内容。文秋芳（2002）也认为专业英语教材的编写，在以第二语言学习理论成果为依据的同时，还应该以“人的发展”为依据。她指出，传统的教材都有“一个共同的弊端，即教材的编写都是以语言自身的规

律为出发点,而忽视了大学生本人的整体发展。由于教材的编写一味强调以结构/功能为纲,教材内容只为学习语言结构和语言功能服务,因此往往浅薄,不贴近现实生活,不注重对学生人生观、世界观的系统培养,更谈不到对学生终生学习和研究能力的培养”。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对人的培养和注重人的整体发展也应该纳入到综合英语课程的定义之中。因此,本书对该课程的定义如下:

综合英语是一门英语专业的专业基础主干课,其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运用英语的能力。主要通过语言基础训练与篇章讲解分析,使学生逐步提高语篇阅读理解能力,了解英语各种文体的表达方式和特点,扩大词汇量和熟悉英语常用句型,具备基本的口头与笔头表达能力。

教师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上的各种语言交际活动以获得基本的交际技能,并达到《大纲》所规定的听、说、读、写、译等技能的要求;通过语言技能培训和语言知识学习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文化观,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提高学生的自信心,使学生在学科知识的学习、当代社会经验的获取、个人素质的培养等方面均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

2.2 定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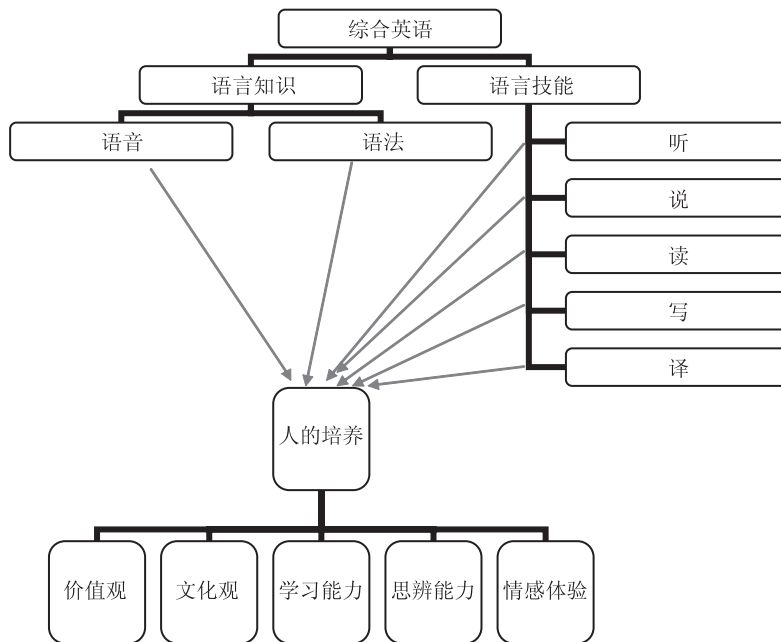
综合英语在英语专业的整个课程设置中应该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在整个课程体系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大纲》将综合英语(基础英语)定位为专业技能课,是一门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运用英语的能力的课程。通过学习该课程,学生应该具有一定的语篇阅读理解能力,具备基本的口头与笔头表达能力以及交际能力,在听、说、读、写、译等技能方面达到《大纲》的要求。

陆鸣等(2002)把综合英语定位为英语专业技能课下属的、以解读文本意义为主要目的的知识性课程,认为基础英语课既不同于阅读课注

重外在语言的阅读技巧培训，又不同于语音、语法课注重对语言纯理性的分析。基础英语课的侧重点应该是对语篇意义全方位的深刻解读。

我们认为，综合英语课是一门既包括语言技能训练，也包括语言知识学习的综合课程，技能训练和知识学习主要是通过篇章学习来完成的。除此之外，综合英语课还应该注重对学生价值观、文化观的培养，注重对学生思辨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注重对学生自信心的培养，注重学生愉悦学习情感的体验（见图一）。



图一 综合英语课程的定位

3. 综合英语教材

3.1 教材的定义

俞红珍（2005）把教材定义为“一切有效地传递、体现课程内容和

承载课程价值的文字与非文字材料。”也有学者认为教材的定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如程晓堂（2002）提出：“广义上的教材是指课堂上与课堂外教师和学生使用的所有教学材料，比如课本、活动册、故事书、补充练习、辅导材料、自学手册、录音带、录像带、计算机软件、复印的材料、报刊杂志、广播电视节目、幻灯片、照片、卡片、教学实物等等。”而狭义上的教材是指：“根据教育行政部门颁布的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的要求、针对特定学生群体的需要而编写的英语教学用书，通常也称英语教科书。”

本书采用程晓堂（2002）对教材的狭义定义。

3.2 英语教材简介

综合英语教材的发展与其他英语教材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我们首先对其他英语教材的发展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我国的英语教学在教材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各种统编英语教材以及各英语院系的自编教材种类繁多。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出版了各种高校英语教材近千种，极大地推进了英语教材建设水平和教学水平的提高。

有不少教材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较大的影响^①。20 世纪 50 年代编写出版的英语专业教材有《大学英语课本》（陈琳、王宗光等编）。60 年代编写出版的《英语》（1~4 册，许国璋主编），《英语》（5~6 册，俞大纲主编），《英语》（7~8 册，徐燕谋主编），为英语专业提供了极好的基础教学资料；而《英语语法手册》（薄冰、赵德鑫合编）和《实用英语语法》（张道真编）等语法教材至今仍然是高校英语专业教学和中小学英语教学的重要参考资料。因为特殊的政治背景和文化环境，70 年代的外语教材建设受到了很大的干扰和破坏，几乎没有像样的成果面

^① 庄智象先生对我国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英语教材作了非常全面的列举，本书采用了他的这一列举，并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出处：《关于英语专业本科生教材建设的一点思考》，载《外语界》，2005 年第 3 期（总第 107 期）。

世。进入到 80 年代, 英语教材建设很快迎来了它的第一个繁荣期。这期间编写出版的有:《英语》(1~4 册, 北京外国语学院胡文仲主编);《英语》(1~4 册, 北京大学西语系编);《高级英语》(1~2 册, 北京外国语学院张汉熙主编);《英语》(1~4 册, 上海外国语学院李观仪、薛蕃康主编);《交际核心英语》(1~4 册, 广州外国语学院李筱菊主编);《功能英语教程》(1~3 册, 黑龙江大学英语系编);《英语基础教材》(山东大学吴富恒主编)。此外还编写出版了几十种英语语言知识、文学和文化方面的教材, 如《英语语法要略》(南京大学吕天石主编);《新编英语语法》(上、下, 上海外国语学院章振邦主编);《美国英语应用语音学》(广州外国语学院桂灿昆主编);《英语语音学引论》(四川大学周考成主编);《简明英语语言学》(上海外国语学院戴炜栋主编);《英语词汇学》(复旦大学陆国强主编);《英语词汇学》(武汉大学林承璋主编);《实用英语词汇学》(大连外国语学院和上海外国语学院汪榕培、李冬合著);《英语听力入门》(华东师范大学张民伦主编);《英语应用文》(上海外国语学院钱维藩主编);《英国文学史》(1~4 册)、《英国文学作品选》(1~3 册)、《美国文学选读》(1~2 册)、《20 世纪欧美文学史》(均由南京大学陈嘉主编);《英国文学史》(五卷本, 北京外国语学院王佐良主编);《英国文学选读》(1~3 册, 复旦大学杨岂深主编);《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外国语学院侯维瑞主编);《英美文学选读》(南京师范大学桂扬清主编);《美国 20 世纪小说选读》(华东师范大学万培德主编);《当代美国文学》(1~2 册)、《英国短篇小说选读》、《美国短篇小说选读》(均由上海外国语学院秦小孟主编);《心理语言学》、《语言学概论》(均由广州外国语学院桂诗春主编);《语言问题探索》(中山大学王宗炎主编);《英语文体学引论》(北京外国语学院王佐良主编);《英语文体学入门》(华中师范大学秦秀白主编);《英语语言史》(北京大学李赋宁主编);《英语文化读本》(北京外国语学院许国璋主编);《欧洲文化入门》(北京外国语学院王佐良主编);《英汉翻译教程》(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张培基主编);《汉英翻译教程》(西安外国语学院吕瑞昌主编)等等。

20世纪90年代以后编写和出版的英语教材有《新编英语教程》(1~8册,上海外国语学院李观仪主编);《交际英语教程·核心课程》(1~4册,广州外国语学院李筱菊主编);《高等师范院校英语》(1~4册,上海师范大学黄次栋主编);《英语泛读》(1~4册,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曾肯干主编);《新编英语泛读教程》(1~4册)、《新编英语口语教程》(1~4册,均由南京大学王守仁主编);《现代大学英语精读》(北京外国语学院杨立民主编);《大学英语教程》(1~2册,北京外国语学院胡文仲主编);《精读英语教程》(复旦大学沈黎主编);《英美文学史》(河北师范大学吴伟仁主编);《美国文化简史》(南开大学袁海旺等编);《英美现代文论选》(四川大学朱通伯编);《英美文学工具书指南》(北京外国语学院钱青主编);《实用英语口语教程》(北京外国语学院吴冰主编)等等。

3.3 综合英语教材简介

在众多的英语专业教材中,曾被各英语院系用作综合英语教材的大致有:20世纪50年代编写出版的《大学英语课本》(陈琳、王宗光等编);60年代编写出版的《英语》(1~4册,许国璋主编),《英语》(5~6册,俞大纲主编),《英语》(7~8册,徐燕谋主编);80年代编写出版的《英语》(1~4册,上海外国语学院李观仪、薛蕃康主编),《交际核心英语》(1~4册,广州外国语学院李筱菊主编),《功能英语教程》(1~3册,黑龙江大学英语系编),《英语》(1~4册,北京外国语学院胡文仲主编);《英语》(1~4册,北京大学西语系编);《英语基础教材》(山东大学吴富恒主编);《高级英语》(1~2册,北京外国语学院张汉熙主编)。这些教材的编写出版极大地推动了英语专业的教材建设,推动了英语学科的发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新中国建设和发展所需要的英语人才,繁荣了学术研究,提高了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

20世纪90年代以后,英语专业教材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不少综合英语教材进行了修订,同时又编写出版了一批出版规模和使用规模都较大的统编教材,如《新编英语教程》(1~8册,上海外国

语学院李观仪主编);《交际英语教程·核心课程》(1~4册,广州外国语学院李筱菊主编);《高等师范院校英语》(1~4册,上海师范大学黄次栋主编);《现代大学英语精读》(北京外国语学院杨立民主编);《大学英语教程》(1~2册,北京外国语学院胡文仲主编);《精读英语教程》(复旦大学沈黎主编)。这一阶段的综合英语教材在编写思想、编写体制、编写原则、编制成果方面有了全新的变革。同时,随着国内校际间的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范围也越来越大,教材编写者开始倾听更多教材使用者的意见,使综合英语教材在编写内容、使用方法、语言理念等方面更具包容性。此外,国外的新学科理论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被引进到我国的英语教学中来。英语教学的研究者和从业者开始关注新的相关学科及研究领域,如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言学习理论、语用学、语义学、国情学、修辞学、语法学、文化交际学、测试学、生成语法、功能语法,并将其理论知识与我国的英语教学、英语教材建设结合起来,拓宽了教师的视野,进一步推动了英语教材的建设,加快了英语学科的发展。

4. 英语教材研究

尽管我国的英语教材研究像英语学科其他方面的研究一样,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在不断深入,但是其步伐相对较慢,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而且呈现出分散、不集中、各自为政、不成体系的特征。“……我国的外语教材如今遇到了许多严峻的挑战。繁荣底下掩盖着危机。有各方面的原因,但是研究工作跟不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①我国英语教材研究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英语教材研究成果的形式主要是学术论文,学术专著较少。我们通过中国期刊网(搜索关键词是“英语教材研究”)、www.baidu.com和www.google.com(搜索关键词是“英语教材研究专著”)对这些成果进行了

^① 摘自邹为成教授2005年6月22日给笔者回复的邮件。

搜索。论文形式的英语教材研究成果主要来自于中国期刊网。将论文发表的年代分成三个时段进行搜索,即 1979—1989 年,1990—1999 年和 2000—2006 年。搜寻的检索项是“主题”,检索词是“英语教材研究”,采用“模糊匹配”,范围是“全部期刊”,搜寻更新的“全部数据”。以下是搜索结果的概述。

4.1 1979—1989 年间的研究

我们在中国期刊网上一共搜到 70 项这一时期关于“英语教材研究”或有“英语”、“教材”、“研究”字样的成果,其中有 14 项是关于英语教材研究的。这 14 项成果中的 3 项研究英语精读教材,1 项研究文体学教材,1 项研究语言学教材,1 项研究泛读教材,1 项研究专业英语教材,3 项研究英语教材编写原则,1 项研究国外英语教材,3 项研究中学英语教材。中学英语教材研究不是我们讨论的话题,因此忽略。

4.1.1 英语教材研究的特点

第一,这一时期的英语教材研究主要是对教材作简单的介绍。例如对《英语文体学引论》(王佐良、丁往道主编)的研究(秦秀白,1988),对戴炜栋、何兆熊、华钧合作编写的《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A Concise Course on Linguistics for Students of English,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研究(戴炜栋等,1986),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受湘、鄂、豫英语教学研究会的委托,并在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总会的支持下,为大专院校英语专业编写的基础阶段泛读教材《大学基础阶级英语泛读课本》的研究(王芳宜,1986),对《科技英语基础教程》(全书分三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3 年)的研究都属于对教材内容、章节、使用对象等方面的简单介绍。上海外国语学院李观仪等在推介自编教材《英语》第一、二册时,也只是把“编写意图、内容及其主要特点作一简略的介绍”(李观仪等,1980)。

第二,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开始受到关注。尽管还缺少用相关理论知识指导教材研究的明确意识,但下意识里人们在进行教材研究时已经开始关注相关理论知识了。例如在对《新概念英语》三、四册的研究中,

研究者开始注意到“外语教材往往是与心理学、语言学、教育学等科学研究成果相联系的”(章卫文, 1985)。

第三,教材编写的相关原则得到了初步重视。尽管此时的教材研究仍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教材评价更只是个人的体会和看法,但是教材的内容和题材、语言教学的特性以及教材针对的对象等与教材关系密切的因素已经初步成为了教材研究的内容。“对语言教学的枯燥性加以补救,应该首先从教材开始,即在编写教材时,不仅要考虑思想性、科学性,也应把趣味性放到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来。”(徐静茜, 1985)教材应该如何使用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例如入门问题。“英语如何入门是一个关键性问题。门不入好,语音学习没有良好的开端,以后整个学习过程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如何安排好这一阶段的教学是编写课本时首先碰到的问题。”(张道真, 1982)另外,教材的主要使用者——学生——在教材编写中的作用也初步地成为英语教材研究的内容。例如,周谟智在介绍北京外国语学院当时使用的英语教材时认为“学生变了,教材也要变”(周谟智, 1980)。

第四,英语专业教材研究多于非专业教材研究。很明显,这个阶段的教材研究大多是英语专业教材研究,非英语专业的教材研究只有 1 项,即关于一本科技英语教材的研究。其研究目的是为了指导“如何编写教材,做到针对性强、内容新,既适合于打好语言基础,又能满足学生毕业后工作、科研及深造等多方面的需要”(王维镛, 1983)。

4.1.2 综合英语教材研究的特点

这一时期的综合英语(精读)教材研究主要集中在当时流行的三套教材上,即北京外国语学院胡文仲等四人合编的《大学英语教程》、大连海运学院英语教研室主编的《基础英语》和上海外国语学院李观仪等人编写的、供当时高校英语专业一、二年级学生使用的《英语》。此时的综合英语(精读)教材研究只是笼统地研究语言形式和语言技能在教材中的体现。正如福建师范大学姜瑞璋在研究胡文仲等四人合编的《大学英语教程》时所说的那样,“练习材料丰富多彩,很重视语言基本功的训练,通过口头和笔头多种形式的练习,使学生深刻理解课文和巩固

学到的词汇，确实是一本好教材”（毛华奋，1988）。因此，这一时期对综合英语（精读）教材的研究尚处在最基础的阶段。

4.1.3 专著形式的研究成果尚缺

以“英语教材研究专著（1979—1989）”为搜索关键词，在 www.google.com 的“中国的网页”上进行搜索，搜到了 218 项与“英语教材研究专著”相符的条目，但是打开网页后并没有显示任何英语教材研究专著。以同样的方式在 www.baidu.com 上搜索结果只有 3 个条目与英语教材研究专著相符，其中也没有教材研究专著。因此，我们认为，在 1979—1989 年间，我国的英语教材研究专著尚未面世，或者至少可以说不能在目前中国最大的两个搜索引擎上呈现出来。

4.2 1990—1999 年的研究

在中国期刊网上的搜索结果表明，我国这一时期的英语教材研究无论在成果的数量上，还是在研究的覆盖面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的搜索仍然以“英语教材研究”为关键词，仍然采用模糊匹配，范围是全部期刊，搜寻全部更新的数据，以时间为序，共搜寻到 239 条与“英语教材研究”相符的项目。其中关于英语教材研究的共 49 条，包括英语专业精读教材研究 5 项，语法教材研究 3 项，听力教材研究 2 项，翻译教材研究 2 项，语音教材研究 1 项，教学法教材研究 1 项，写作教材研究 1 项，职大、电大、成人教育的英语教材研究 5 项，“一条龙”英语教材研究 2 项，研究生英语教材研究 1 项，中学英语教材研究 10 项，大学英语教材研究 12 项，其中科技英语方面的专业英语教材研究 2 项，研究教材编写原则的 4 项。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总数比 1979—1989 年间多了 35 项。尽管中学英语教材研究、研究生英语教材研究以及职大、电大和成人教育的英语教材研究不是本书阐述的主要对象，但是这方面的成果确实喜人。所谓“一条龙”英语教材研究指的是大中小学英语教材的衔接性、统一性、系统性研究，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的英语教材研究已经不再完全独立、单一和各自为政，而是进入了系统的、统一的研究阶段。

4.2.1 英语教材研究的特点

第一, 研究覆盖面变广。这一时期的英语教材研究覆盖面甚广, 英语专业的英语教材研究涉及精读教学的方方面面, 涉及语法、教学法、翻译等专业知识课程的教材研究, 还涉及听力、写作等语言基本技能训练教材的研究。更加值得一提的是, 语音教材研究也占了本阶段研究成果的一席之地。非英语专业的教材研究更是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职大、电大、成人教育的教材研究也是成果喜人。“一条龙”英语教材研究更显示了我国英语教材研究的一种全新视角和研究理念上的革新。

第二, 研究层面开始加深。本时期的英语教材研究层面更深, 不仅涉及语言形式、语言技能在教材中的体现, 还涉及文化因素、修辞格、练习设计的科学性、教材与大纲的关系, 以及教材的适应性等更深层次的议题。许俊(1997)认为文化知识在教材中的介绍应该更加具有系统性和计划性, 而且, 知识文化以及交际文化应该贯穿于教材编写的始终, 这样才能帮助学习者认清本族文化和所学文化之间的差别, 才能有助于学习者从本族文化中心论的狭隘视角中解放出来。张同乐等(1999)认为“修辞是修饰文字词句, 运用各种表现方式, 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和生动有力的一门语言艺术。修辞格则是这门语言艺术粹集形成的修辞方式, 亦是语言活动规律的抽象概括; 而它在特定语境中的运用, 却是具体的、多姿多彩的”。他强调, “《大学英语》(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1.6)的课文, 就蕴含着丰富、新颖、洗练的修辞方式, 它使课文的题旨、情景得到了最恰当的语境烘托。”张小龙(1999)和顾惠民(1994)分别就教学大纲与大学英语的翻译教学和词汇教学在教材中的体现作了较为精辟的叙述。谷春珠等(1995)认为英语教材应该设计科学的和有创造性的练习, 以使学生能通过练习把所学的知识升华和提高。贾冠杰(1994)认为教材的编写不仅应该具有科学系统的特点, 还应该依照“学生的实际水平和心理认识过程的客观规律”。只有这样, 才能编写出符合学生实际需要的教材。

第三, 研究开始具有理性。本时期的教材研究呈现出客观、实事求是的特点, 不再像 1979—1989 年间的教材研究那样只唱赞歌, 不指出

缺点。教材编写时的疏漏、教材存在的弊端、教材编写所存在的问题，已经成了教材研究的话题。教材研究者大胆地指出教材中的问题，敢于向一些教材编写权威人士挑战，不人云亦云，不曲意逢迎，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英语教材研究的一大幸事，也是我国英语教学界的一大幸事。这标志着我国的英语教材研究从随意的个人感受向客观的，甚至是科学的研究迈进。王宏远（1999）从杨立民等主编的《大学英语教程》第四册中的课文 *Three Days to See* 中有一处遗漏，造成读者理解上的困难谈起，指出教材是教与学的纲领性文件，应该有很强的严谨性。沈奇（1999）认为教材造成教学存在弊端的重要方面之一，是教材编写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缺乏可教性和可学性。陈孟智（1994）将张培基等编写的颇具权威的《英汉翻译教程》中诸如错译、漏译、概念模糊、译文范文不准确等问题一一提出来商讨，可见研究者的认真与执着。

第四，研究开始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本时期的教材研究更具科学性，具体表现如下：（1）随意性和主观性的研究逐渐减少，相反，有理有据的研究不断增多。研究者要么以事实为依据对教材进行研究，如上文中提到的谷春珠、张小龙、王宏远、陈孟智等人；要么以理论为依据进行研究，如张小龙、顾惠民等人的研究就是以教学大纲为依据。众所周知，大纲是一门学科权威的理论性文件，以它为准的教材研究因此更具科学性。（2）国外的教材编写理论被初步引进到英语教材研究中来。比如郑树棠等（1997）在探讨大学英语教材编写原则的过程中，采用了“Johns 和 Davis 提出的对 EFL 教材编写影响最大的理论 TAVI (Text as Vehicle for Information)。他们把传统的教材编写与语言学习方法称为 TALO 方法 (Text as Linguistic Object)。TALO 的主要目的是用课文来例示语言的句法结构与词汇用法；而 TAVI 首先要注意文章的内容和信息”。结合这两种教材编写理论，作者把“学习需求”和“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情感因素不容忽视”作为重要的编写原则提了出来。（3）科学的教材评估体系得到初步关注。钱瑗（1997）根据 van Els 等人的理论提出了教材评估应该注意的事项：根据课程教学大纲或评估一览表逐项调查；以问卷调查或访谈的方式了解教材使用者的意见；对数种教材的特点进